

对外政策优先还是国内政治优先?

——埃卡特·克尔关于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
扩张问题的研究

赵光锐

内容提要 德国历史学家埃卡特·克尔将社会和经济力量引入对第二帝国海军问题的研究,针对传统兰克史学所遵从的“对外政策优先”原则,提出“国内政治优先”的论断。克尔在德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基础上,揭示海军扩张与帝国主义政策这两个问题与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状况、阶级结构、利益集团和政党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克尔的研究侧重社会史,强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重视阶级分析方法的使用,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克尔的研究表明,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书写在档案之外还应关注更广阔的经济、社会力量,兼顾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综合社会、文化、经济和观念诸方面并展现它们相互影响和交织的立体图景。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德国 埃卡特·克尔 海军 国内政治 外交政策

* 赵光锐: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邮编:210023)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本文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双一流”建设项目“德国国际关系史学的历史发展与思想传统研究”的阶段成果。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海军扩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一直是德国史和国际关系史学者关注的重大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年青历史学家埃卡特·克尔(Eckart Kehr)就发表了有关德国海军和对外政策问题的一系列开拓性论文,1930年出版了《海军建设与政党政治 1894—1901:德国帝国主义的国内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前提》一书。^① 克尔的研究完全打破了德国史学的书写传统,鲜明提出了“国内政治优先”(Primat der Innenpolitik)的论断,从国内政治视角揭示海军扩张、帝国主义政策与德国的社会经济状况、阶级结构、利益集团和政党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克尔在当时默默无闻甚至受到学术上的排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却被新一代史学家们“重新发现”,这对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德国史学和西方的外交政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几年国内关于海权和海洋战略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威廉德国作为新兴的欧洲强国,其海权战略与国家兴衰之间有何关联,对后来的新兴大国有何教益是国内学者思考的重点。这些关于“海权对于德国历史的影响”的研究集中于国际关系、海军战略或军事史,忽视了德国具体的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克尔的研究早就揭示,如果不考虑当时的德国国内政治,就无法真正理解和解释1897年之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和海军问题。当代西方德国史和外交史学界对克尔越来越重视,《舰队建设与政党政治》是研究第二帝国历史无法绕过的著作,国内相关研究却鲜有重视甚至提及。^② 本文主要从国际关系史学角度,对克尔的学术思想做初步梳理和评介,重点关注他在对外政策研究中提出的国内政治优先思想及其关于威廉德国海军扩张问题的研究。

一、从“对外政策优先”到“国内政治优先”： 克尔对德国传统史学的突破

克尔1902年生于勃兰登堡,在战争中度过了青年时代,这促成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所处时代混乱性的根源。1927年他在柏林大学完成博士学习,导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933年

^① Eckart Kehr, *Schlachtflott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Versuch eines Querschnitts durch die innenpolitischen, sozialen und ideolog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Berlin: Emil Ebering, 1930, Bremen: Europäischer Hochschulverlag, 2012.

^②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孟钟捷教授曾指出克尔思想在德国现代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参见孟钟捷:《“独特道路”:德国现代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反思》,《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4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梅然在专门探讨德国为何会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中曾简要介绍克尔的著作和核心观点,参见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他得到美国进步主义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的帮助到美国进行关于拿破仑战争时期国际金融与政治的研究。克尔患有先天性心脏病,1933年5月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发作,逝世于华盛顿,年仅31岁。克尔极有天赋,又对历史研究充满激情,学术生涯虽然短暂,却留下大量精彩作品。1927—1933年间,他出版了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舰队建设与政党政治》,发表了12篇文章,完成了一部485页的教授资格论文手稿《普鲁士改革时代的经济与政治 1807—1813》,计划出版的四卷本档案汇编也完成了前两卷1500页,还有一系列已经完成但未发表的手稿。1965年,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维勒(Hans-Ulrich Wehler)编纂出版了克尔的文集《国内政治的优先性:19和20世纪普鲁士—德国社会史文集》,^①关于克尔短暂的一生及其主要学术成绩,维勒在为文集所做的“导论”中做了精彩的叙述和评论。1977年,斯坦福大学的德国历史和外交史研究专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将此书译成英文,书名改为《经济利益、军国主义与对外政策:德国历史文集》。^②他的《普鲁士改革时代的经济与政治 1807—1813》因手稿失踪,具体内容不为后人所知。德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格哈德·A.李特(Gerhard A. Ritter)认为,克尔“在1927—1933年的短短几年间以其道德—政治上的激情和学术上的责任感投身到关于普鲁士—德国历史的争论以及对1918年失败的深层原因的思考中,他是魏玛共和国末期那些反对德国历史书写传统的叛逆历史学家们当中最激进,也是最有原创性和最具天赋的那个人”。^③

克尔学术活动所处的魏玛时期,兰克史学思想依然在德国历史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立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是19世纪德国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近代西方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对于德国史学具有革命性的影响。自兰克之后的德国史学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一国的对外政策具有优先性(Primat der Außenpolitik),国内政治应该服从于对外政策的需要。兰克将国家看作是最有意义的单位,它既是权力的集中体现,又是精神性实体,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要服从国家,因为在一个健康的国家中,自由是与服从相一致的。每个国家都是鲜活的、独具特性的“生

① Eckart Kehr,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Preußisch-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Hg., Hans-Ulrich Wehler,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65.

② Eckart Kehr, *Economic Interest, Militarism, and Foreign Policy: Essays on German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③ Gerhard A. Ritter, "Review,"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d. 53, H. 2, 1966, S. 240.

命个体”,其成长和发展取决于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独立程度。兰克从对外政策角度解释国内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宪法形式、国家体制,认为国家把对外政策置于优先地位源于个体的生存发展本能,对外政策与一国的自由、独立息息相关,独立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所有的内部关系都是以维持国家的独立和地位为目标建立起来的,这是“最高原则”。^① 国家总是着眼于以最大可能和最有效的方式实现对外政策的“最高原则”,并据此制定内部政策,一国内部的斗争相较于国家整体的权力政治和对外关系而言是第二位的问题。极为推崇兰克的迈内克认为,权力政治和对外政策是“所有政治的真正的中心”,也是“兰克的历史观和国家观的中心”。^② 总体上,将对外政策置于首要地位是兰克国际政治观的核心特征之一。^③ 兰克的研究还一直强调两个观念:大国和均势,这也是其名篇《论诸强国》(*Die GröÙen Mächte*)的两大主旨。在兰克看来,国家是最主要的人类历史生活的体现者,而国家和民族又是“不平等”的,只有那些伟大的国家和民族才具有历史意义,“在历史上,人类的观念只在伟大的民族中得到了体现”。^④ 大国的兴衰及它们之间的竞争、战争与和平构成了兰克所理解的欧洲历史的主要画面,欧洲国家体系在均势与霸权间的反复循环则是欧洲自 17 世纪后期以来的核心历史脉络。历史研究应该关注那些“在历史上扮演了突出的、积极角色的(民族)。我们应当关注这些民族对彼此的影响,关注他们彼此间的斗争,关注他们在和平与战争时期的发展”。^⑤ 因此,兰克史学研究的核心是政治史、外交史,以及在其中居于关键地位的政治人物。与兰克同时代或稍后的德国历史学家如约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 G. Droysen)、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海因里希·冯·济贝尔(Heinrich von Sybel)、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等也基本上把权力视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历史就是政治史,坚持政治尤其是外交事务在历史中居于关键地位,大国间的斗争应被看作是

① Leopold von Ranke, *Politisches Gespräch*, Berlin: Duncker&Humnlot, 2005, S. 37.

② Friedrich Meinecke, „Einführung“, in Leopold von Ranke, *Politisches Gespräch*, S. 9.

③ 需要指出,兰克本人并没有使用过“外交政策优先”的说法,最早概括并使用这一术语的是德国历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外交政策优先”这一说法用以阐述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后经新兰克学派的作品而被广泛传播。1924 年,兰克的《政治对话录》重新出版,迈内克在导言中对兰克的外交政策优先思想做了更为清晰的阐释,参见 Friedrich Meinecke, „Einführung“, in Leopold von Ranke, *Politisches Gespräch*, S. 5-15.

④ Leopold von Ranke, *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Hg., von Theodor Schieder und Helmut Berding, München: De Gruyter Oldenbourg, 1971, S. 9.

⑤ [美]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对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刘耀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3—34 页。

历史的中心。^①同时,统一德国的“俾斯麦道路”的成功,展示了历史进程中政治权力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史也在德国史学中取得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克尔直接挑战了“政治是由对外政策的需要所决定的”这一传统德国史学的核心假设。虽然很早就有德国学者指出兰克史学对国家内部经济和社会力量的严重忽视,但是在方法论和具体历史研究上并没有实质性突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及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开始将国家及其政策更多地看作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层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客观历史存在。迈内克也开始怀疑国家权力的道德意义,并意识到政治家们在形成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会受到国内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影响。^②韦伯对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国家对外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他在《经济和社会》中探讨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以及德国官僚统治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国家作为权力实体,其行为是由社会中相互竞争的阶级以及相同地位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和某一阶级、群体的主导地位所决定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实际上都是相互竞争的国内群体的需要和权力关系的表现。扩张主义尤其是现代欧洲的帝国主义源于国家内部的社会紧张,帝国主义被统治精英当作减轻来自下层压力、维持自身权力的“社会安全阀”。^③亲历了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韦伯对国内政治、官僚机器、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等如何“毁坏”德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声望深有感触,他在战前就主张通过改革国内政治尤其是加强议会制来增进对外政策的质量和合理性。不过,他最终认为德意志民族的事业和在世界上的地位远比国体问题重要,改革和议会化等主张也是以帝国主义的权力政治为目标,实际上间接承认了对外政策的优先性。^④

比克尔稍早的柏林大学经济史教授古斯塔夫·冯·施默勒(Gustav von Schmoller)和历史学家奥托·欣策(Otto Hintze)在经济史、社会史研究方面做出很大成绩,尤其是欣策深入反思了传统德国史学所崇拜的国家概念。他认为国家并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不能将国家比拟为个人,它只是由处于互动关

① [美]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109页。

② Friedrich Meineck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glischen Bündnisproblems 1890-1901*, München: Oldenbourg, 1927, S. 6.

③ [德]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186页。

④ 蒙森对韦伯关于德国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个人经历、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做了深刻分析,认为从政治立场而言韦伯本质上也是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参见[德]沃尔夫冈·J. 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阎克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190页。

系中的个人所构成的,并没有国家本身这样的东西,这就要求关注国家行为赖以生成的社会和政治过程。但是,他也认为国际关系对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给经济史引入了兰克式的对外政策优先性。^① 魏玛时期的德国历史学家乔治·哈尔伽滕(George Hallgarten)在1935年出版了《1914年之前的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对外政策的社会学基础》,^②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帝国主义的国内经济、社会结构与对外政策的相互关联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但是在方法论上没有像克尔那样明确系统的探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史学依然被对外政策优先的信条左右,普遍认为1914年以前德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和战争的爆发都是由德国所面临的迫不得已的国际形势决定的。真正最早打破兰克史学的信条,将国内政治的优先性置于对外政策的优先性之上的是克尔。《海军建设与政党政治》“或许标志着对于传统德国史学的唯心主义假设的最勇敢的挑战”。^③ 克尔批判了对外政策优先原则的有效性,称之为德国保守主义的遗产,已经变成19世纪一种无法撼动的官方意识形态,史学界对其有效性的迷信如同16世纪人们相信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一样。这种历史研究方法把国家看作是一个超阶级的、按照自身需要独立运作的制度。它之所以会变成官方的权力哲学和德意志帝国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因为这是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可以诱导资产阶级同保守的统治者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工人阶级。^④ 克尔指出,“一项对外政策不仅针对面前的敌人,也是针对国内那些背后的敌人;一项外交政策的目的不仅是要与敌人斗争,而且是为了支持国内。这些论断看似老生常谈,但却往往被人忽视。”^⑤ 国家和政府也不是超阶级的统一实体,而是要对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包括官僚阶层自身的压力做出回应的机构,因此,对外政策就绝不是隔绝于社会 and 国内政治斗争而独立运作的领域,而是某个时期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反映。

克尔并没有绝对否定外交政策优先的假定,他提出只有当能证明外交行动是出于“纯粹的对外动机”时,这一假定才成立。要或多或少为外交立场找

① 〔美〕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320—321页。

② 该书是哈尔伽滕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博士论文,1935年在巴黎出版了其缩略版,1951年出版了完整版,后经大幅修改在1955年和1963年再版。在该书1963年版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永远难忘的埃卡特·克尔。”参见 George W. F. Hallgarten, *Imperialismus vor 1914. Die soziologischen Grundlagen der aussenpolitik europäischer Grossmächte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 München: C. H.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63。

③ 〔美〕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325页。

④ Eckart Kehr,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S. 87, S. 152。

⑤ Ebenda, S. 150。

到统一的全国性基础,如果发现一个国家的对外诉求是分裂的,那么,研究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及其与内政和社会形势之间的关联性就显得更为重要。他认为,孤立的研究外交政策或仅将外交政策看作是纯粹的“内阁事务”和由少数人决定的问题,在方法论上是不合理的。这种方法也许能用以研究某个具体外交谈判的细节和技术性过程,但是对于分析整个时代的外交基础和动因则不适用。决策者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本身就是某种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的代表或处于两者的强大压力之下。外交档案和回忆录只是呈现了表面的决策过程,却无法体现国内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于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影响。对克尔来说,外交史的研究还要突出整个时代的“鲜活的总体性”(die lebendige Totalität)。他认为,这是研究专制主义的学者们的成功之处,因为他们一直强调把对外政策与军队状况、国内政治与重商主义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问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兴起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实质上都缺少对一种所有力量共同作用的分析。^①

克尔尤其不同意传统德国史学把政治史作为研究中心,他抛弃了自己的老师——迈内克的概念史研究,而是试图从物质方面——经济和社会关系中寻找历史进程的推动力量。克尔研究的核心是力图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强调作为一种共同存在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的相互关系,关注由经济因素和社会分化引起的政治影响。克尔“并不致力于细致入微地重建历史现实和简单再现历史的发展过程,而是从一种社会批判和极端民主主义的立场,突出强调德国政治的连续性,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结构、阶级矛盾以及经济和政治的紧密相互作用当中揭示这种连续性”。^② 克尔的研究实际上直接反驳了迈内克所坚持的国家理性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优先性的观点,对其整个概念史形成挑战。克尔认为,概念史是特定的德国社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当时的学者要么认可并支持权势政治,要么做一个反对它的社会民主党人,概念史就是对这种两难选择的逃避。概念史不愿意直面政治和社会现实,试图与之保持距离,最终将历史学从一门科学改造成一门“艺术”。^③

按照克尔的说法,他研究的主要是社会史,核心是研究重大事件中经济和社会因素相互交织的疑难问题,他的社会学方法主要受益于韦伯和德国经济

① Eckart Kehr,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S. 157.

② Hans-Joachim Blank, “Politische Wissenschaften oder die Verdrängung: Erinnerung an Eckart Kehr,”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Vol. 11, No. 4, 1970, S. 628.

③ Eckart Kehr,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S. 261.

学家卡尔·布林克曼(Carl Brinkmann)。他的研究 also 具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使用的主要概念实际上都来自马克思和韦伯。^①他把马克思“经济对于政治的决定性”的论断与韦伯关于工业化时代生活关系的全面理性化假设结合在一起。克尔充分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研究的基础建立在德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上。在他看来,经济利益、阶级冲突和社会结构是理解社会问题和国家政策的关键,人的生活条件、包括官僚机构在内的所有社会领域都已深入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不应该过多突出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和决定,而是更应该关注那些伟大人物活动于其中的客观结构。“个人的竞争和冲突实际上发生在更大的体系结构中,历史问题不在于个人对这些体系的变动性影响,而是体系、阶级对人的行为的制约性,以及人对于既定利益格局的屈从。”^②他重视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第二帝国海军扩张问题,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性文章《阶级斗争与帝制德国的军备政策》《提尔皮茨海军宣传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及专著《海军建设与政党政治》中。克尔对世纪之交德国各个经济部门、阶级、政党在舰队问题上的态度和各自背后的经济、社会利益做了深刻详细的分析,阐明了他们相互间的斗争和妥协所决定的德国国内政治与海军扩张及对外政策间的关系。他的总体观点是:帝国主义、世界政策和军备扩张等这些第二帝国后期的重大问题都是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状况引起的,德国外交上的孤立和东、西方向上的困境,应该更多从德国内部无法解决的社会和经济矛盾中寻找原因。至少到1912年之前,对外政策绝不是德国扩张军备的背后动力,相反,纯粹是统治者和军队领导层出于国内政治考虑提出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大力支持的扩大舰队、世界政策等没有被当作国家职责,而是维持统治的手段。这些方法的运用和不同以往的结论使克尔对第二帝国外交政策、国内政治和军备政策的历史分析具有极强的原创性和启发性,从而也在实质的学术研究上突破了德国传统史学的牢笼。

二、德国大转折年代的国内政治、社会阶级与海军扩张

在战败的氛围中,反思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成为魏玛时期德国历史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海军扩张是其中的核心

① 克尔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史学家,而只是在研究社会史,参见 Eckart Kehr,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S. 259。

② Ebenda, S. 109.

问题之一。对外政策是当时研究海军问题的主要视角,关注英德围绕海军军备的竞争和谈判、扩建海军与世界政策的关系等。以迈内克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德国从19世纪末开始的海军扩张是德国对欧洲列强日趋激烈的权势竞争和殖民地争夺的反应,是制衡法国与对抗英国霸权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再就是从德国决策者的视角进行研究,关注威廉二世、提尔皮茨,以及首相比洛、贝特曼—霍尔韦格等人的思想和活动,虽然也重视分析决策者所处具体内政外交格局和背景,但是倾向于把海军扩张的动因归结于个人性格、决策失误和权力纷争等。^① 克尔提出尖锐质疑和批评,认为它们或者局限于单一外部事件的影响,或者仅从与英国军备政策的关系来研究,或者单纯强调只有强大海军才能保护海洋利益这一所谓“迫不得已的压力”。“与英国结盟谈判的失败被看成是德国对外政策的关键转折点而备受关注,这分散了研究者的注意力,使他们忽略了1900年代德意志帝国复杂的国内形势,形成了从单一的对外政策角度解释海军扩张的主导性观点。”^② 他批评迈内克关于英德联盟谈判的研究时说:“外交政策的分析纯粹限于行动与反行动这样的你来我往,好像这只是一个在封闭空间内进行的游戏。”^③ 他提出在第二帝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中研究海军问题的新思路,同时努力将德国海军扩张第一个时期(1894—1901年)内的政治、社会、经济和观念史的不同领域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图像”(ein geschlossenes Bild)加以全面的研究。

克尔认为,威廉时期的海军扩张是德国自1848年革命以来国内政治、社会阶级、工农业经济、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等因素复杂发展、相互影响过程的一部分。民族国家时代的革命源于人们对更大自由的追求。法国大革命后,民族革命的追求有双重目标:对内,面对君主和专制政权,经济上的个体要争取更大的个人自由;对外,作为个体集合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也要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关系中追求更多自由。^④ 1848年革命体现了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种自由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对当时的德意志民族而言,对内是推翻专制政权,解放个人和受束缚的资本主义经济,对外要清除妨碍和干涉德意志民族追求自身生活方式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外力量。这些也是德意志产生国家

^① Friedrich Meineck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glischen Bündnisproblems 1890-1901*; Hermann Bächtold, “Der entscheidende weltpolitische Wendepunkt der Vorkriegszeit,” *Weltwirtsch. Archiv*, No.20, 1924; Hans Hallmann, *Krügerdepesche und Flottenfrage*, Stuttgart: Kohlhammer, 1927.

^② Eckart Kehr, *Schlachtflott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S. 8.

^③ Eckart Kehr,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S. 179.

^④ Ebenda, S. 3.

权势政治(nationale Machtpolitik)思想的根源。丹麦及其对德意志海岸的封锁是当时损害德意志民族独立和经济自由的主要障碍,要打破封锁,只有建立一支舰队。因此,1848年的国民大会在选出一个帝国的领导层之前就提出了舰队计划。^① 舰队是保证民族经济自主的重要力量,可以带来国家实力的增长,这种观念一直存在于德国发展海军的历史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始终把建立一支强大舰队作为目标,其代表人物德国政治家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在1900年总结道:“自由主义已经找到了这样的思想,皇帝也表达了这种思想:帝国的权力就是海洋权力。”^②到19世纪末,德国海军建设的意识形态基础发生了变化,对外政策上海军被看作保持经济独立和进行经济扩张斗争的工具,从国内政治而言,“威廉二世的聚合政治(Sammlungspolitik)力图使工业和农业部门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支持其世界政策并对抗无产阶级的威胁,海军建设计划及其成功则被视为稳定其日益脆弱的统治的工具。”^③

克尔指出,1897—1902年这段时期内,第二帝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生的重大转变和一系列危机是理解后来的“德国悲剧”的关键,“决定1914年国内和对外政策总体形势的那些历史力量和因素都已孕育其中”。^④ 作为大转折年代,它既是德国历史向“世界政治”发展的过渡时期,也是伴随聚合政治、世界政策、农业危机、工业的繁荣和大萧条的年代,提尔皮茨舰队计划的出现正是这样“复杂不明”的时代的一部分。通过分析19世纪末德国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克尔阐明了威廉德国外交政策和扩建海军的根源。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社会分化和阶级结构,造就了德国两股最强大的现代社会力量:一方面是资本—工业阶层及其与传统农业经济力量的斗争,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及其打破资本主义经济锁链的努力和反对已有社会秩序的革命,这动摇了俾斯麦帝国赖以立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的根基。同时,德国日益增强的人权观念对权力政治的反抗、民族的统一国家(nationale Einheitsstaat)向日渐分裂动荡的资产阶级主导的阶级国家(bürgerliche Klassenstaat)的转变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危机,各政党、公众舆论、经济界领袖和政府领导者对内、对外都感受到了新的危机局势。扩建舰队的决定与当时德国人社会和经济生

① Eckart Kehr, *Schlachtflott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S. 3-4.

② Ebenda, S. 5.

③ Ebenda, S. 7.

④ Ebenda, S. 207.

活所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①

克尔还认为,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社会被农业危机和无产阶级危机这两大危机所动摇,由此在国内政治上形成了两种主要的格局:一是保守的封建地主与民族自由派的工业主之间的利益矛盾和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二是这两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日益崛起的无产阶级的冲突。这两大矛盾影响了德国国内政治、外交和海军的发展方向。保守的大地主敌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领导者——英国,他们也害怕德国将英国经济模式作为榜样。虽然在政治上同情俄国,但是由于来自俄国剧烈的谷物竞争,他们要求对俄国的谷物征收保护性关税。农业集团反对修建巴格达铁路,也是因为害怕在俄国之外再增加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谷物竞争。德国工业主阶级由于工业品国际竞争的原因加入了地主阶级的反英阵线。由于向俄国出口工业品及金融和商业上与俄国的密切关系,德国工业主阶级希望与俄国交好,在谷物关税问题上与地主阶级存在矛盾,因为俄国为报复谷物关税而限制进口德国工业品并与法国进行更为紧密的金融和贸易合作。在克尔看来,第二个海军法案的通过是大地主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联姻的结果。大地主阶级以同意舰队扩张来换取工业主阶级对谷物关税和保有土地所有权的支持。外部威胁和殖民地争夺只是被当成社会动员的一种手段,舰队被宣传描绘为保证民族生存、实现反英的世界政策的必需工具。克尔对此表述是:“在对外政策上,资本家放弃了自己的亲俄政策,同意了大地主们的反俄立场,以此换取大地主们对资产阶级所鼓吹宣传的海军建设计划的支持,该计划一直遭到地主阶层的阻挠。帝国领导层在世纪之交推行聚合政治以把相关阶级联合在一起,要实现这一目标,外交上的出路就是采取既反英又反俄的政策。”^②

聚合政治被克尔看作影响威廉德国国内政治和海军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一策略的提出者是威廉二世的亲信、普鲁士财政大臣约翰纳斯·冯·米柯尔(Johannes von Miquel),其基本意图是通过打造重工业和农业统治阶级之间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联盟,来避免德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海军计划很大程度上就出于聚合政治和对抗国内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的直接目的。同时,通过扩张性的世界政策来挑战国际秩序,制造出种种外部危机,借此达到国内团结的目的。工业主和农业主阶级需要合作以阻止日益强

① Eckart Kehr, *Schlachtflott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S. 8.

② Eckart Kehr,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S. 183; Eckart Kehr, *Schlachtflott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S. 172, S. 262-263.

大的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但是他们的联盟又很脆弱，单纯对无产阶级进行消极抵抗并不像世界政策和扩建海军这种主动积极的进攻手段能取得更好的“黏合”效果。米柯尔的策略是，提高谷物关税既可以为扩建海军提供财政收入，又可以换取农业主阶层的支持，而工业主阶级因谷物关税所遭受的损失则会通过建造舰队获得补偿。经济动机在德国海军协会主席萨尔姆(Ott Fürst zu Salm)给提尔皮茨的信中也体现得很清楚：“通过加速舰队建设，许多工业部门将接到新的订单，不仅可以保持我们的海上优势，也可让人们有事可做，工人们能够卖力干活，失业的重新获得工作。但最重要的问题是，通过新的战舰建造计划及由此带来的商业和工业形势的活跃局面，可以抬高相关的股票行情，拯救许多的财富并吸引更多的财富投入市场。”^①在提尔皮茨看来，建造强大舰队这一新的“民族任务”不仅将确保德国的世界强国地位，而且与经济成功联系在一起，这将终结社会主义者那些乌托邦式的宣传，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止痛剂”。聚合政治正是通过这种“狡猾”的手段促成两个阶级联合起来。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反对舰队计划越强烈，两个统治阶级的联盟就越牢固。因此，克尔认为连续两个海军法案的通过，完全不是出于国家紧迫的对外政策局势考虑，纯粹是由聚合政治所伴随的三个层面的意图所决定的：一是工业与舰队发展，二是世界政策和扩张，三是大地主们提高关税的要求、保守集团维护社会统治地位的努力，以及保持天主教中央党的政治霸权地位的企图。他指出，“容克地主和天主教统治阶层的利益联盟不仅是关税政策的基础，而且成为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实现世界政策与舰队建造计划的前提条件”。^②

克尔也关注世纪之交围绕海军建设所进行的大规模宣传对德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1897年是第二帝国内政外交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威廉二世决定加强“个人统治”，试图成为掌控德国全局的关键，尤其在外交事务上要发挥领导作用。他委任比洛为外交大臣，提尔皮茨为海军国务秘书，米柯尔为普鲁士财政大臣。比洛和提尔皮茨都极为重视宣传，将之作为推进海军计划、世界政策和威廉二世“个人统治”的重要手段。比洛在外交部成立了新闻办公室，负责宣传官方政策并试图掌控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媒体。威廉二世希望海军部能加强宣传活动，让人撰写了《宣传备忘录》，拟定了重要的海军宣传目标：要让海军军官们真正相信海洋利益，要使他们与德国殖民地协会(Deutsche

① Eckart Kehr,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S. 146.

② Eckart Kehr, *Schlachtflott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S. 146-147, S. 205.

Kolonialgesellschaft)、泛德意志联盟(Alldeutscher Verband)等建立联系;海军学院应该开设民族经济学的课程;把《海军评论》(Marinerundschau)变成宣传中心,成为其他报刊杂志的信息源;从皇帝个人支配的资金中划拨专款资助宣传活动等。这些“理论设想”都由提尔皮茨强有力地转化成实践。

克尔指出,提尔皮茨异常重视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公众舆论,强调其作为“重大的不可知因素”的作用。“他追求的是军事目标,但是需要现代国家的民主力量作为其计划的基础,首先是全体大众,其次是对大众起凝聚作用的议员。他通过新时代公共生活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经济和理性主义来赢得这两类人的支持,关键是向大众解释并让他们相信舰队的经济价值。”^①他于1897年7月成立帝国海军新闻办公室,进行有计划、大规模的关于世界政策、海洋利益、扩建海军等方面的宣传。他为该机构制定的任务包括:向德国人民进行宣传 and 教导,使其明白民族的海洋目标和海洋需求;控制报刊;通过自己的出版物对其他出版物加以支持、阻止、限制或影响;支持有影响的学者和政治家关于海洋和海军的个人活动并向他们提供材料;做好各种协会的工作,进行展出和放映;热情答复关于海军的问题;把海军宣传部门变成力量的中心,扩大海军圈子,让海军人尽皆知,广受欢迎。“这些计划的实施,让新闻办公室在新时代似乎占据了海军部的中心位置。”^②一些民间团体如殖民地协会、泛德意志联盟和德国海军协会也成为海军新闻办公室的重要帮手。从1897年开始,公众已经觉察到德国议会决策上的危机,海军宣传对这种政治形势的发展推波助澜,影响了世纪之交德国人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推动了德国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对海权、海洋利益的意识形态式理解。克尔认为,世纪之交德国这种“由一个力量中心所控制的宣传活动在规模和影响上是史无前例的”。^③

三、被“重新发现”的克尔:追随者与反对者

克尔的方法和观念是对传统德国史学的重大突破,在海军问题和外交政策的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研究,但是在当时这并不是一个学术史意义上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既没有立刻带来德国史学内部激烈的大规模争论,也没有从总体上改变德国史学主流的书写传统。相反,克尔的思想经历了从被压制、遗

① Eckart Kehr, *Schlachtflott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S. 105.

② Ebenda, S. 95-96.

③ Ebenda, S. 97.

忘又被“重新发现”的曲折过程。由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近似扼杀式的苛刻，战后的德国人不愿意正视战争责任，依然确信战前德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合理性和外交行为的正当性，克尔的研究则完全否定了这些主流观点。更关键在于他的研究方法是对德国史学传统的彻底抛弃，在当时的同行尤其是老一派学者们看来，他的异端观点和尖锐分析极其让人不快。迈内克虽然给了克尔的博士论文“优异”的成绩，但是也提醒这位显得异类的学生：“如果不能有所节制和适度，年轻人又如何真正开拓向前？”^①

克尔的研究侧重社会史，强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作用，重视阶级分析方法，这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学术氛围中是无法被接受的。克尔在 1931 年曾以《海军建设与政党政治》来申请柯尼斯堡大学的任教资格，遭到柯尼斯堡大学教授汉斯·罗特菲尔斯(Hans Rothfels)的拒绝。弗莱堡大学教授格哈德·里特(Gerhard Ritter)在给他的老师柏林大学教授海尔曼·昂肯(Herrmann Oncken)的信中透露说：“汉斯·罗特菲尔斯已经拒绝了埃卡特·克尔在柯尼斯堡的任教申请。昨天我从普鲁士政府收到克尔先生的论文，要我为他申请施泰因奖金做出决定。我也将会拒绝克尔先生并且完全赞同罗特菲尔斯及其动机。对我来说，这位先生看起来好像更愿意在俄国而不是柯尼斯堡任教。他显然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对我们的历史学来说极其危险的‘纯正的布尔什维克’。”^②已经成名的、掌握学术权力的老一代学者并没有真正从学术角度对克尔的研究做出公正评价，而是纯粹从政治立场来决定年青学者的“饭碗”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自身代表的传统史学如何保存正统地位，害怕新方法和新观念带来的侵蚀和挑战。克尔对这种氛围和政治偏见深有感触：“社会史被奇怪地等同于社会主义史。谁写作社会史，谁就会被视作社会主义史学家，即便他其实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或者保守派。”^③以上种种原因使克尔的研究被淹没在德国学术的长河中。

20 世纪 60 年代初，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的一系列论文以及《争雄世界：帝制德国的战争目标政策 1914—1918》一书，从国内政治视角提出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目标、战争起因和罪责问

① Eckart Kehr, *Schlachtflott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S. 5.

② Hans-Ulrich Wehler, Hg., *Imperialismus*, Köln: Kiepenheuer, 1970, S. 241.

③ Eckart Kehr,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S. 259.

题的重新思考,引起巨大争论。^①在“反思史学”兴起的背景下,^②克尔的价值被重新认识和评估,《海军建设与政党政治》也在1965年和1966年两次重印并被译成英文,被奉为新史学的经典。再加上1965年文集的出版,克尔的思想引起西方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克尔被“重新发现”的更深层原因是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史学对德国历史的批判主义视角占据主要地位,在战后全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成长的新一代德国学者基本都赞同民主制。“德国的‘特殊道路’不再是从德罗伊森到里特的民族学派视为的德意志民族的特殊成就,而是一桩悲剧性的遗产,历史学的功用曾被视作对过去民族成就的肯定,而现在被看作是对过去历史的批判性审查。”^③从这样新的“时代精神”出发,年轻的德国史学家们赞同,希特勒的政策与他的第二帝国的前辈们的世界权力政策之间具有连续性和相似性,德国经历“浩劫”的原因,要从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特性和更长远的历史长河中追寻和反思。克尔的批判性视角和方法,正是契合他们学术抱负的“崭新”路径,经济和社会力量对德国传统政治和对外政策所起的影响成为新史学关注的重点。

以维勒为代表,德国涌现出一批以相同方法和视角重新审视德国历史的出色学者,例如,弗尔克·贝尔格哈恩(Volker Berghahn)、德克·施蒂格曼(Dirk Stegmann)、海尔穆特·博默(Helmut Böhme)、沃尔夫冈·J.蒙森(Wolfgang J. Mommsen)等。克尔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具体问题也启发了这些后来者,例如,海军政策、聚合政治、利益集团、海军宣传和海军民间团体等都被进一步梳理和深入研究。他们中的一批人甚至被认为形成了一个“克尔学派”(Kehrsche Schule)。^④在对德国海军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的目光也从欧洲大国关系转向德国内部。以德国的贝尔格哈恩、威廉·戴思特(Wilhelm Deist)、美国的霍尔格·赫尔维格(Holger H. Herwig),以及英国的吉奥夫·艾莱(Geoff Eley)等为代表的德国海军史研究专家对威廉德国海军扩张

① Fritz Fischer,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918*, Düsseldorf: Droste, 1961.

② 欧美学界一般把费舍尔和维勒为代表的德国史研究称为“修正主义”(Revisionism)史学,把克尔当作“修正主义”史学的源头。实质上,费舍尔和维勒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全新的历史条件和价值观念下对传统史学尤其是德国“特殊道路”(Sonderweg)进行反思性、批判性研究,称之为“反思史学”更为恰当。

③ 〔德〕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379页。

④ 关于所谓“克尔学派”这一有争议的说法,参见 Wolfgang J. Mommsen, “Domestic Factors in German Foreign Policy Before 191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6, No.1, 1973, pp. 6-8; Geoff Eley, “Die ‘Kehrites’ und das Kaiserreich: Bemerkung zu einer aktuellen Kontroverse,”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4 Jahrg., H. 1, 1978; Hans-Jürgen Puhle, “Zur Legende von der ‘Kehrschen Schul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4 Jahrg., H. 1, 1978.

的国内动因及其历史过程作了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贝尔格哈恩的《提尔皮茨计划：威廉二世治下一项国内政治的危机战略的兴衰》就是从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视角研究第二帝国海军问题的新经典之一。^① 新一代史学家接受了克尔关于现代德国历史分析的总体框架，但也没有盲目追随他。主要的差异在于，“他们较少使用克尔所倚重的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政党和意识形态等概念，而是小心翼翼地埋首于经济利益集团的档案堆中”。^② 他们对克尔的理论做了某些修正，承认单纯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史并不能全部解释一些重大的国际冲突和事件。他们同时也坚持了若干基本假设。一是抛弃了兰克史学的国家概念，不再将国家看作是超越相互冲突的各种社会和阶级利益的实体，而是在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压力下做出回应的权力组织；二是坚持外交政策应该首先基于作为整体的一个社会的内部争论和冲突的结果来加以解释。

与在德国的经历相比，克尔及其思想从一开始就获得了美国学者“温暖的接受”。1931年，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就已阅读《舰队建设与政党政治》并发表书评，1933年，他帮助克尔获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到美国开展研究。克尔的国内政治优先性理论和对利益集团在德国海军扩张中所起作用的分析影响了比尔德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思想，他关于当时美国海军扩张和外交政策的研究都运用了克尔的方法，这体现在他关于美国海军的评论文章，以及《国家利益的观念》和《国内的门户开放》两部作品中。^③ 20世纪60年代以后，克尔在英、美学界获得了更多认可。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对威廉德国海军问题的出色研究集中于英德关系和外交谈判的视角，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感叹：“整幅图景已经相当清晰了，很难相信，从外交角度对英德谈判的研究还会有多少新的信息能进一步丰富历史学家们的知识。然而，人们极大忽视了——如果除去20世纪20年代埃卡特·克尔那孤独的声音的话——德国国内政治对于英德联盟谈判失败的影响，尤其是对1897年以后德国海军发展和殖民地扩张的影响。”^④ 他开始关注德国国内政治，其文章《德国的世界政策与同英国的联盟谈判1897—1900》正是从这一视角所做的重要研究，新结论认为，提尔皮茨

① Volker Berghahn, *Der Tirpitz Plan. Genesis und Verfall einer innenpolitischen Krisenstrategie unter Wilhelm II.*, Düsseldorf: Droste, 1971.

② [德]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384页。

③ 关于克尔对比尔德学术思想的影响，参见 Arthur Lloyd Skop, “The Primacy of Domestic Politics: Eckart Kehr and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Charles A. Beard,” *History and Theory*, Vol.13, No.2, 1974.

④ Paul Kennedy, “German World Policy and the Alliance Negotiations with England, 1897-1900,”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5, No.4, 1974, p. 605.

的海军政策是导致德国拒绝与英国结盟的决定性因素,德国的殖民雄心也起了重要作用。^①其后来的代表作《大国的兴衰》对威廉德国发展趋势的分析显然也突出强调了国内政治和社会状况。^②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外交史和外交政策研究也兴起了强调和重视国内政治的思潮,以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③阿诺·迈耶(Arno Mayer)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④等的研究为代表。迈耶在对欧洲战争的根源和外交政策的研究中甚至直接借用了克尔“国内政治优先”的表述。^⑤他们受到当时德国史学争论的直接影响,在将德国作为具体历史案例来论证其基本理论假设时都将克尔、维勒和贝尔格哈恩等的研究作为重要的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尔并不是没有批评者。德国历史学家爱伯哈德·科尔伯(Eberhard Kolb)在评论《国内政治的优先性》一书时认为,单纯从经济社会的制约和发展趋势的角度并不能揭示政治领域的单个事件或重大决定的最深层次的动机。^⑥蒙森则指出,克尔忽视了个人或群体的心理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在体系内部,掌握决策权的个体性人物间的竞争和关系非常关键,而克尔仅仅把个体置于一种阶级或群体的规则性、约束性之中,只是关注有共同利益和价值取向的阶级或政党的群体性竞争,淡化了个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⑦还有一些德国历史学家提出,国际体系内部的权力政治过程具有自身显著的独特动力,是无法通过国家内部的政治关系或冲突来加以阐明的。有学者从结构史学角度指出,对国家间关系的研究不论是强调国内政治优先还是对外政策优先,都有失偏颇。例如,德国战后新一代史学家特奥多·席德尔(Theodor Schieder)在其《欧洲史手册》(*Handbuchs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第6—7卷的序言中提出,要从精神、政治、社会发展的总体角度来分析权力政治的过程,并在方法论上做了深入探讨,发展出一种更精致和全面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网络交织性的叙述方式,不仅关注历史行为背后的精神动力,而且重视研究

① Paul Kennedy, "German World Policy and the Alliance Negotiations with England, 1897-1900," p. 606.

②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上册),王保存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224页。

③ James Rosenau, ed., *Linkage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④ [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 Arno Mayer, "Internal Causes and Purposes of War in Europe 1870-1956: A Research Assignment,"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1, No.3, 1969; Arno Mayer, "The Primacy of Domestic Politics," in Holger Herwig, ed.,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6th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6.

⑥ Eberhard Kolb, "Review",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Vol.XI, 1966, S. 334.

⑦ R. Höttler, "Review," *Sozial Welt*, 20. Jahrgang, H. 3, 1969, p. 373.

对象所处制度、社会、经济的背景及其结构,强调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性研究。^①

“聚合政治”的概念也是后来的历史学家如施蒂格曼、贝尔格哈恩等解释第二帝国后期政治社会发展、海军政策等的重要框架,有学者则提出了批评。艾莱认为,聚合政治在威廉二世时期并不是那么稳固,地主和工业主的联盟极其脆弱,各个政党和派别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分化组合当中,聚合政治没有达到统治者设想的目标,对德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并不像克尔所言那样大。^② 对克尔关于海军扩张是纯粹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这一论点的质疑声最多,尤其是与英国的军备竞赛和德国海军的作战计划显然不是单纯的国内政治问题,而是更多受国际形势和英德关系的影响。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德国历史学家汉斯约阿希姆·科赫(Hannsjoachim W. Koch)批评了克尔对英德联盟谈判失败原因的分析。克尔认为是地主和工业主的利益联盟,以及保护性关税和海军法案破坏了两国的联盟计划。科赫指出,在联盟谈判中,经济压力对英、德根本就没起作用,海军军备也是极为边缘化的问题和考虑。在当时不存在英德结盟的可能,尤其是英国根本不愿放弃战略上不受约束的自由地位。^③ 美国奥本大学教授威廉·哈维·梅尔(William Harvey Maehl)通过对倍倍尔(August Bebel)与1900年海军法案关系的研究,认为克尔的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倍倍尔等社会民主党人对提尔皮茨计划以及德国帝国主义的态度。倍倍尔反对海军扩张,主要是由于对外政策的考虑而不是出于策略上对聚合政治的抵制。倍倍尔也认识到,军备竞赛将加重帝国财政负担,不利于劳动阶级,但这并不是他反对海军扩张的主要原因。作为亲英主义者和反俄主义者,他坚信与英国接近将保证德国的未来,而海军扩张计划将激化英德矛盾,使英国寻求与法、俄靠近,德国将被孤立。^④

结 论

克爾的历史观念基本建立在“反兰克史学”的基础上。针对兰克史学外交

① Wolfgang J. Mommsen, “Gegenwärtige Tendenzen i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Bundesrepublik,”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Kontroversen über Historiographie*, 7. Jahrgang, H. 2, 1981, S. 170-171.

② Geoff Eley, “Die ‘Kehrites’ und das Kaisereich: Bemerkung zu einer aktuellen Kontroverse,” S. 92-94.

③ H. W. Koch, “The Anglo-German Alliance Negotiations: Missed Opportunity or Myth?” *History*, Vol. 54, No. 182, 1969, pp. 390-392.

④ William Harvey Maehl, “German Socialist Opposition to the Tirpitz Plan: Bebel and the Naval Law of 1900,” *The Historian*, Vol. 40, No. 4, 1978, pp. 704-706, 712.

政策优先的假设提出了国内政治优先的原则,针对政治史的主导性地位以及重视个人作用的倾向,他倡导社会史并将社会和经济因素看作历史进程中的主要力量。在20世纪20、30年代德国特殊的氛围中,克尔的“声音”是孤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治和价值观念的巨变带来学术研究理念和方法的更新,克尔的思想才获得年轻一代史学家们的热烈回应。克尔的遭遇说明学术研究总是受制于客观现实,但体现了创新勇气的可贵。克尔的思想也启示国际关系史学者,要全面深刻理解国家间关系,外交文件和档案是基本依据,但是仅仅在这些材料基础上研究少数垄断外交决策的政治精英的行为和动机,以及国家为单位的政治—权力互动博弈远远不够。外交档案和文件主要记录呈现了外交活动的策略、技术、互动和方案,却不能反映外交行为者所处时代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变迁。在决策者背后还隐藏着更为强大的力量——他们自身所代表的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利益以及这些利益所形成的压力。同时,单一的精英决策、社会经济因素、历史文化、国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视角都难以充分说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它们往往是这些多重因素彼此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当代的国际关系学者基本都有这种认识,但能够兼顾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综合平衡政治、社会、经济和观念诸方面并展现它们相互交织的“立体图景”的出色研究却并不多见。^① 综合性研究也不同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关注每个层面的具体情况,而不同层次、主体间的复杂互动才真正构成事件发生的整体。综合性研究可能会被批评为“折中主义”,但对研究者的要求也更高,对丰富生动、复杂多变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解释力也更强。需要指出,除关注经济利益、社会结构和利益集团外,克尔也对世纪之交德国人的精神状况、意识形态等做了较多探讨,对于关键人物的行为和思想也多有涉及,他试图努力展现这一时期的“鲜活的总体性”,但确实淡化甚至否定了德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和大国竞争因素。

^① 保罗·肯尼迪是能较好综合平衡各因素进行研究的学者,代表性的是《皇帝与德国的世界政策:反思威廉二世在制定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一文,参见 Paul Kennedy, "The Kaiser and German Weltpolitik: Reflections on Wilhelm II's Place in the Making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John C. G. Röhl and Nicholas Sombart, eds., *Kaiser Wilhelm, New Interpret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在外交史研究中,国内能将国际环境变迁、国内政治变革、外交演进和历史延续性等方面的互动与影响加以立体探索和交织呈现的代表性学者是章百家,参见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当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